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重点课题

十年巨变

TEN YEARS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总主编
◎ 本卷主编

李静杰
潘德礼



俄罗斯卷

Russian Federation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十年巨变

——俄罗斯卷

总 主 编：李静杰

本卷主编：潘德礼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巨变/李静杰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0

ISBN 7-80199-118-4

I. 十... II. 李... III. 俄罗斯—现代史—研究
IV. K5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1022 号

书名:十年巨变

总 主 编:李静杰

分卷主编:潘德礼 赵常庆 何 卫 朱晓中

责任编辑:李一梅 张国华 春 秋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6

字 数:1716 千字

印 张:85.12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118-4/K·86

定 价:288.00 元(全四册)

总 序

1991年12月25日,镶有斧头和镰刀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落,标志着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不复存在,苏联解体了。自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年多。“东欧剧变”一般是从1989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上台算起,到1991年6月南斯拉夫解体告一段落。从南斯拉夫解体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12年多。苏联解体使一个国家分裂成15个国家;东欧剧变使7个国家变成了12个国家。这样,在原来“苏东地区”,再也不是8个国家,而是27个国家了。

在过去十多年,人们目睹最多的是从巴尔干经外高加索到中亚这一战略弧形地带局势的动荡,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冲突和战争。与此同时,人们也非常关注这些国家内部的变化。许多读者经常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们走上了什么样的道路?走到了哪里?从他们走过的道路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和教训?等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决定撰写四卷本的专著——《十年巨变》。

早在1998年,我们就开始酝酿对这些国家发生的新变化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撰写系列专著,以飨读者。但是,作为重点课题的全面落实,还是在2001年。专著总名称定为《十年巨变》。“巨”者,大也;“变”者,变化也。“巨变”是对客观过程的描述,说明这场变化不是小变,也不是中变,而是大变。所以说,这里的“巨变”没有“褒”和“贬”的意思。

《十年巨变》分为四卷:《俄罗斯卷》、《中亚与外高加索卷》、《新东欧卷》和《中东欧卷》。《俄罗斯卷》只写俄罗斯一个国家;《中亚与外高加索卷》包括中亚5国和外高加索3国,共8个国家;《新东欧卷》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3国,共6个国家;《中东欧卷》包括中欧4国和巴尔干7国,共11个国家。

《十年巨变》各卷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各个研究室集体撰写的。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追踪研究这一地区和这些国家发生的事件,从未

间断。《俄罗斯卷》的主编由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潘德礼担任；《中亚与外高加索卷》的主编由原中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常庆担任；《新东欧卷》的主编由乌克兰研究室主任何卫担任；《中东欧卷》的主编由原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晓中担任。各卷的具体设计、组织实施和定稿工作，由他们承担。

尽管《十年巨变》各卷的结构安排不同。但是每卷基本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着重介绍这些国家变革的过程及其结果；第二个方面是对变革过程中某些突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理论上加以分析。

对于第一部分，我们力求做到系统、全面、准确。所谓系统，就是着眼于这些国家十多年来变革的全过程；所谓全面，就是尽可能包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对外政策等各个方面；所谓准确，就是客观、求实，向读者展现事物的本来面目。

第二部分是在对这些国家改革过程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力求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思考，这是本书突出的特点。说句实在的话，要对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十多年来的变革做一个全面和科学的评价，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还难以做到。所以，在立论方面，我们不要求作者在观点上保持一致，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许多观点都曾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过反复的讨论乃至争论。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仅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国际战略格局。这一事件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相反越来越明显。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的十多年，这27个国家一直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意味着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演变；从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意味着大多数国家从一个国家内的行政区域向独立国家转变。

这些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至少可以看

到,这里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些重大而不可逆转的变化:

第一,抛弃了以“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和“一种所有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选择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发展方向;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发生了从所谓的“极权主义”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尽管在一些国家旧体制的痕迹还非常明显,“民主共和制”的形式和实际内容还有距离;

第三,在经济制度方面,发生了从单一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多种所有制和市场体制经济的转变,尽管许多国家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有相当距离;

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①的指导地位和作用,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

第五,在对外政策方面,转向同西方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一些中东欧国家已经通过加入北约和欧盟,融入了西方。

在过去十多年,这些国家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为变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以俄罗斯为例,1998年与199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50%,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40%,综合国力的下降更不待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寿命缩短。1993~2000年,由于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75万。从1985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8年。到了第20年时能不能恢复到1990年经济的水平?根本不可能!在科技革命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20年(岂止20年!)意味着什么!亚洲的“四小龙”不是就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经济腾飞的吗?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初步建成了小康社会。需要指出的是,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并不比俄罗斯好,有的甚至更糟。

在这27个国家中,只有中东欧少数几个国家经受的困难和曲折较少,较快

^① 为了表达的方便,这里姑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历史已经证明,原苏联东欧国家领导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其中包括附加的、原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地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那些较早摆脱危机并走上稳定发展道路的国家都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它们在历史和文化上同西欧相同或更加接近;其二,在剧变以前由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许多因素已经具备。而那些直到现在还在苦难中挣扎的国家恰恰是缺少这些条件。看来,这些现象又验证了一个普通而往往容易被政治家们忽视的道理:摄取任何外来的东西,都要考虑自身的条件。

善于向别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善于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进步和兴旺发达的标志和源泉。但是,学习外国,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外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不管它多么完善和美好,都不能生搬硬套;如果强行移植,其结果必然是“生于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不仅学不好,学不像,而且连自己原有的优势也会丢掉。

人类是从昨天走到今天的,又从今天走向明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随意割裂。对于历史文化,人们可以进行改造、创造,但是不能割断、抹杀。谁试图割断和抹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例子,包括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的改革过程中的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民主幼稚病”也在许多国家蔓延。患这种病的人认为,只要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福音就会降临,万事均将大吉。多年来,关于“民主必然带来发展”的理论被反复宣传,似乎已成了不容怀疑的定律。但是,实际生活并不能总是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现在,全世界62%的国家宣称实行了民主制度,但是真正因此而实现了发展和富裕的国家却寥寥无几;而那些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却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极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这样对比并不是为了证明,民主不是好东西,或者说,可以不要民主。恰恰相反,真正的民主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可以相信,世界上所有国家或迟或早,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但是,民主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制度,都是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民

主作为制度,只有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并有相应的政治文化作保证,才能够持久并有效地运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同西方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相适应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情况下,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过来,一蹴而就,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冒险。

关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如前所述,有些国家已经加入了北约和欧盟,融入西方社会,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作为发展目标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外一回事。看来,这些国家还有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要走。

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这种社会制度不可能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生长出来,也不能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必须站在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够生长和发展起来,显示它的优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名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①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由于新事物(社会主义)是对旧事物(资本主义)的否定,所以它和旧事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任何新事物又都和旧事物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由于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并不是把旧事物内部的一切因素全盘抛弃,而是否定旧事物中那些过时的、失去了存在条件的消极因素。至于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则作为新事物发展的条件,经过改造以后,加以吸收,成为新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新事物对旧事物绝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在否定中有肯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是扬弃。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辩证的否定规律的理解。按照这一原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的关系,而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扬弃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第51页。

系。对于资本主义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要作为自己的发展条件,积极吸收并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先进与否,不应该仅看它挂什么招牌,打什么旗号,而应该看它能否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完备的物质条件,而且准备了充足的文化条件。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却作了另外一种选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经济和文化也相当落后,有的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从“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即不是先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而后无产阶级才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再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在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创业,建设社会主义,但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在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完成任务,例如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科学教育,建设法治国家,等等。这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矛盾:共产党人一方面宣传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领导国家和人民追赶发达资本主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对于这一矛盾的历史现象缺乏自觉的认识。所以,当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创造出奇迹的时候,就盲目乐观地认为,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在世界范围内“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而当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的时候,就自暴自弃,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只能放弃社会主义,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舍此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多年来我们在原苏联东欧地区所看到的普遍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现时

代基本矛盾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世界多样性的主张。“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①这是对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关系的精辟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这里所说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当然既包括社会主义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世界上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要么是资本主义的,非白即黑,这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世界发展的现实。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不是简单的“谁战胜谁”、“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长期共存的关系,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关系。

我们尊重俄罗斯以及东欧和中亚各国人民自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我们相信,经受了困难和曲折的各国人民,一定能够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书无论在资料方面,还是在观点方面,一定有不少疏漏、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李静杰 2004年9月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前言

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算起,时至今日转瞬间已过了十年有余。俄罗斯的这十年明显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992~1999年的8年为“叶利钦时代”,2000年进入“普京时代”。

过去的十年对俄罗斯来说变化是巨大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经济上,与苏联解体前的俄罗斯相比,1999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50%,降幅远远大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甚至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人民生活陷入普遍贫困。在政治上,在向西方民主制度转变过程中及之后,相伴而来的是激烈的社会冲突、民族纷争、权力拼杀、阴谋和流血,俄罗斯成了政治角逐的大舞台,政局持续动荡。在国际上,俄罗斯领导人最初希冀通过加入西方阵营来实现自身利益,但西方却对俄罗斯施加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并从地缘政治上对俄罗斯进行挤压,在与西方的利益碰撞中俄罗斯一再受到打击,饱尝失败之苦,与苏联时期的鼎盛相比,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急剧跌落。

俄罗斯的转轨历程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外特别是俄罗斯国内关于俄罗斯问题的著作很多,如: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编《俄罗斯新政策:前提和定向》(莫斯科,1996年版),A·И·波德别列兹金主编《俄罗斯当代政治史(1985~1998)》(第一卷)(莫斯科“精神遗产”出版社,1999年版),叶戈尔·盖达尔主编《过渡时期经济学》(莫斯科,1998年版),维克托·萨德科夫著《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莫斯科“进步”出版集团,2000年版),俄罗斯科学院冲突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研究所编《过渡社会的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危机》(莫斯科,2000年版),Г·B·奥西波夫著《俄罗斯改革的当前任务》(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2000年版),И·B·格兰金著《俄罗斯议会》(莫斯科,1999年版),M·И·科金著《变化“黄昏”中的俄罗斯:进化、革命还是反革命?》(莫斯科,2001年版),M·И·科金著《俄罗斯社会政治团体与政治精英的形成(1990~1997)》(莫斯科,1998年版),

Ю·德罗兹多夫、B·法尔特舍夫著《在通往复兴的道路上：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弗拉基米尔·普京》（莫斯科，2000年版），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国外的一些重要著作已在我国翻译出版，如：[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美]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著、白洁等译《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等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意]朱利叶托·基耶萨著、徐葵等译《别了，俄罗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桂香等译《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曹缦西等译《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著、徐葵等译《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国外的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促进了我国学界对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国内关于俄罗斯问题的著作、论文也很多，全面考察俄罗斯的主要著作有：薛君度、陆南泉主编《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静杰、郑羽主编《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海运、李静杰总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人物五卷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就俄罗斯某一专题或方面的研究著作则更多，主要有：刘向文、宋雅芳著《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董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邢广程、潘德礼、李雅君著《俄罗斯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俞邃、许新、潘德礼著《普京：能使俄罗斯振兴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张豫著《一个人的振兴——直面普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本专著基于前人研究成果，试图对俄罗斯十年来的巨大变化进行总结和评价。在写作上，本书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回答俄罗斯在这十年里做了什么、怎样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做的结果如何，目的是要说明俄罗斯的变化和

变化结果。第二个层次是对一些更深入问题进行思考:(1)对俄罗斯十年转轨作出基本评价;(2)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是什么?俄罗斯何以走上这样的发展道路,其中是否存在必然性?(3)如何解释“叶利钦现象”?

俄罗斯转轨时期的问题十分庞杂且错综交织。尽管本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作出最大努力,尽可能采用最新资料,并力求从理论高度对俄罗斯十年来的改革历程进行概括、总结,但仍难免存在疏漏不到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东欧中亚国家《十年巨变》系列丛书总主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李静杰研究员。本卷主编为该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潘德礼研究员。本卷的具体分工是:

潘德礼研究员: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一、二、三、六节,第十四章(合作),结束语;

李雅君副研究员:第二章第四、五节,第四章;

李景阳研究员:第五章第一、二节;

张树华研究员:第五章第三节;

许新研究员:第六、七、八章;

许志新研究员: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章、第十四章(合作)、第十五章。

全书由潘德礼统编、定稿。

目 录

第一章 俄罗斯初期的政治现实	(1)
第一节 俄罗斯继承的政治“遗产”	(3)
第二节 寻求俄罗斯振兴之路	(6)
第二章 宪政制度的确立与运行	(9)
第一节 宪政制度的确立	(11)
第二节 权力制衡与三权分立	(19)
第三节 “民主政治”的运行	(22)
第四节 选举制度与选举	(28)
第五节 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司法权	(46)
第六节 宪政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49)
第三章 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53)
第一节 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55)
第二节 政党政治与公民政治参与	(60)
第三节 政党格局与党派斗争	(62)
第四节 形成中的政党体制	(69)
第四章 民族关系与联邦体制	(73)
第一节 民族与民族关系	(75)
第二节 车臣问题	(79)

第三节 联邦关系的调整	(84)
第五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	(87)
第一节 利益分割——居民分化的前提	(89)
第二节 新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	(93)
第三节 俄罗斯主要社会思潮	(96)
第六章 经济模式选择和转轨历程	(103)
第一节 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和论争	(105)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进程	(108)
第三节 经济转轨的成本—效益分析和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	(117)
第四节 普京的“第三条道路”	(125)
第七章 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构	(131)
第一节 产权理论与私有化含义	(133)
第二节 私有化的进程	(135)
第三节 公司治理和企业重组	(140)
第四节 国有经济的形式和管理	(142)
第五节 农业所有制的改革	(145)
第六节 金融工业集团	(148)
第七节 私有化的结果、问题和发展趋势	(152)
第八章 宏观经济机制的转变	(159)
第一节 财政体制的改革	(161)
第二节 金融体制的改革	(167)
第三节 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177)
第九章 俄罗斯对外战略的演变	(179)

第一节 “亲西方外交”	(181)
第二节 “多极化外交”	(187)
第十章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195)
第一节 政治关系概述	(197)
第二节 俄罗斯与西方的债务经济关系	(201)
第三节 西方对俄政策的基本点及策略	(204)
第四节 案例分析:围绕南斯拉夫问题的交锋	(206)
第十一章 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	(213)
第一节 俄罗斯与独联体成员国关系概述	(215)
第二节 俄罗斯对独联体战略	(219)
第三节 向心力与离心力	(221)
第十二章 俄罗斯对华关系的重大发展	(227)
第一节 中俄关系发展进程	(229)
第二节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特点	(232)
第三节 决定俄罗斯对华政策的战略因素	(235)
第十三章 普京的“务实外交”	(239)
第一节 普京上台后面临的国际形势	(241)
第二节 新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244)
第三节 对外政策的新特点和基本走向	(247)
第四节 普京外交实践	(250)
第十四章 十年巨变的思考	(255)
第一节 俄罗斯十年转轨基本评价	(257)
第二节 俄罗斯发展道路	(259)

第三节 “叶利钦现象”	(260)
第十五章 俄罗斯进入新时期	(263)
第一节 反映社会变化的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	(265)
第二节 新时期的特点:“可控的民主”	(267)
第三节 普京的社会改造任务任重道远	(270)
结束语	(277)
主要参考文献	(279)
大事记	(283)